新闻与传播评论 JCR
Journalism & Communication Review
第 72 卷 第 4 期 2019 年 7 月
Vol. 72 No. 4 Jul. 2019. 091-103

DOI:10. 14086/j. cnki. xwycbpl. 2019. 04. 008

策略改造与隐性规训:环境话语研究的学术版图

李 娜 王 梦

摘 要:环境话语是以多模态环境符号进行的意义生产再生产,对社会和环境事件建构与被建构的循环实践,作为环境传播核心研究议题,在风险社会语境下对公众风险认知和生态文明建设有重要实践价值。通过文献荟萃法梳理可描绘中国环境话语研究学术版图:从史论视角、实践视角、抗争视角、语境视角、语用视角、功能视角六个视角,研究环境话语的文本表征、意义争夺和社会建构,问题焦点集聚于策略改造和隐性规训;批判话语分析是环境话语研究基本理念,意图突破个体和文本的禁锢,将社会和意识形态纳入分析理路,重在揭示环境话语隐含的政治、霸权和商业等,却懈于调停社会风险和解决环境问题;建议从环境话语的实施本体、时空场域、发展进程三层次和表征、意义、建构、实践四阶段推进环境话语研究。

关键词:环境话语;环境传播;话语分析

中图分类号:G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5443(2019)04-0091-13

项目基金:河北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HB18XW009)

一、研究目的及问题

风险社会语境下,环境传播作为特殊的全球公共议题,可以审视环境背后的公平、法制、权力、文化、分配等问题。[1]各利益主体运用话语、符号及修辞策略,赋予环境议题不同的框架,通过对潜隐风险的具象化及对风险图景的构建,建立并影响风险认知。传播文化模式区别于信息传递模式将传播看成意义共享的过程。符号学的能指所指“生产世界的共享代码和意义地图”,能指能否产生意义依赖于共同的符码和文化。杜威的媒介建构“共识模式”指出,传播是一个国家锻造集体目标和公共认同的手段,创造共通的语言,造就共同体意识。环境话语作为共通的语言,研究其如何穿梭于媒介传播、风险认知、意义空间、符码文化、意识共同体,对环境事件频发的调停有重要实践价值。

胡春阳将传播话语分析理论分为修辞话语分析、言语行为理论与会话分析、福柯话语权力、批判话语分析,话语分析区别内容分析的核心是:话语更强调意义交流或精神交往,重视文本在生产、传递、解读过程中链接的认知、心理、文化、社会等相关因素,注重话语与社会现实和社会关系的交互作用。[2]这也括清了话语分析在传播学视域内的研究进路和范围。

环境话语是环境传播的核心研究议题和重要观测点,是承载话语分析的客体,更是环境传播实用和建构功能的实施本体。不管是罗伯特·考克斯的七大环境传播领域[3],还是刘涛的九大研究领域[4],环境话语研究都位居最前且浸染每个分项。新社会运动频发和网络话语舆论的加权,使微观政治视角下的话语即行动成为共识,福柯提出社会变化的话语本性,全媒体语境下的话语结构和形态变革为环境话语传播提出了时代课题。话语体系广泛深远传播是思想观念获得社会各阶层和谐共鸣、行动共识乃至凝聚成推进时代进步强劲伟力的根本手段,[5]环境话语研究更应接了实现生态文明国家战略的现实意义。本研究研究问题是:

①环境话语研究的话题和视角是什么？

②环境话语研究的依托理论和方法是什么？

③环境话语研究的学术版图、研究路径和趋势图景是什么？

④环境传播、话语分析、环境治理和生态文明的逻辑结合点是什么？

二、样本选取及编码

以知网 CNKI 数据库为检索平台，搜索篇名中含“环境”并“话语”，得到 356 篇文献，经人工筛选，确定 80 篇文献；对此些文献的参考文献或注释、环境传播重点作者和漂绿、风险传播、对抗性话语、环境修辞等重点相关词汇进行二次搜索筛选，共得 108 篇文献样本。中国环境话语研究从 2004 年关注环境矛盾和生态伦理开始，《贫困的守护——有关资源环境保护的话语》[6]探讨了单方强调环境资源保护与无视穷人基本生存发展权利的矛盾问题，马丽提出中国经历 20 余年市场经济高速发展之后，须适时拓展“市场经济伦理道德”和“环境生态伦理”[7]的双重话语空间；研究自 2012 年呈稳步上升趋势，环境公共事件、PM2.5 争议和网络抗争进入研究视野。文献关键词共现图显示研究关注点在：环境问题，话语分析，环境新闻，环境事件，新媒体，生态文明。经典文献包括《风险社会》[8]（乌尔里希·贝克）和《环境传播的九大研究领域（1938—2007）：话语、权力与政治的解读视角》[4]等，划定了环境话语研究的重点归属领域。至今十余年没有固定作者合作网络，只“周裕琼-蒋小艳”“方爱华-张解放”有两次合作。

研究视角编码基于对全部样本的研究主题、发刊级别、篇目数量的统筹考虑分类；理论资源框架参照曹洵研究中国网络抗争性话语理论框架调整制定，鉴于环境话语研究属于新兴研究，凡明确提到理论名称并以此指导分析思路即纳入统计；研究方法分类依据陈阳的大众传播学研究方法划分，并将理论推演、个案研究等本领域突出方法额外标出。编码及统计由笔者一人完成，保证信度和效度。

三、研究发现和分析

环境话语研究分为两大阵营，一是以环境传播为核心，二是以语用研究为核心。

（一）环境话语的概念内涵

20 世纪 70 年代起，国外多名学者从话语角度定义环境传播。1979 年，勒妮·吉列尔雷和克莱·舍恩菲尔德《环境传播研究与评论的文献注释（1969—1979）》从实践角度界定环境话语本体是“围绕环境、环境管理、环境议题方面的文字、语言或视觉信息”[9]。1989 年，德国社会学家尼克拉斯·卢曼《环境传播》认为环境传播“旨在改变社会传播结构与话语系统”，将环境危机界定为环境传播核心话语。[10]20 世纪 90 年代荷兰学者马汀·哈杰将话语分析理论用于环境政策话语研究，认为话语由观念、概念和范畴构成，是“意义被赋予到自然与社会现实之上”[11]。2005 年约翰·德莱泽克《地球政治学：环境话语》首次对环境话语进行系统论述并提出九种环境话语类型。[12]2006 年考克斯《环境传播与公共领域》将环境修辞和话语列于环境传播七大研究领域之首，强调“符号化”和“媒介途径”。[3]国外环境话语在语言学、传播学、政治学、地理学等各领域都有自己理解和定义，但都有共同特点：环境话语具有各种语言形式；表达并建构人类与自然的关系；具有社会性和政治倾向性，是一种社会实践。[13]环境话语在“传播环境观”和“环境传播观”观照下从对环境问题报道、呈现和传播，拓展到话语空间、话语生态、话语体系的社会关联行为。

近十年，在我国环境话语研究逐渐从隐含在环境传播下到成为显现的研究对象和视角。2009 年刘涛集于话语视角界定环境传播是“以生态环境为基本话语出发点，不同社会主体围绕环境议题而展开的文本表征、话语生产与意义争夺实践”，[14]其从话语、权力与政治角度解读环境传播如何从信

息到意义的符号表征和象征建构。[4]周裕琼从话语形式库和策略性框架两条路径上对环境话语概念化,形式上为所能利用的一切文字性和符号性资源,通过“选择、再造、包装、突出等手段对抗争性话语进行策略性框架”操作,实现社会动员。[15]刘景芳研究中国绿色话语特色,认为环境话语可以表达认知、塑造绿色价值观、指导自然行为,是理解和阐释环境问题的重要视角。[16]

(二)研究视角及内容

1.史论视角:中西方环境话语理论与历史

对国外环境话语研究的共时性和历时性分析是重要研究起点。环境传播九大研究领域是我国环境传播研究引用率最高的核心文献,系统的从话语、权力、政治视角审视了环境传播的修辞、话语营销、危机管理、流行文化、环境表征等,首次引介了德莱泽克的九种环境话语类型。[4]沈承诚对德莱泽克的话语分类进行了修正,解析绿色话语如何以不同的形式表达、行动主体、隐喻及修辞创造一种排他性话语体系。[17]岳丽媛对国际环境传播协会的官方杂志《环境传播》进行了文献计量统计发现:“环境修辞与话语”是论文数量最多的领域,气候变化的话语建构是最热门议题,以传播学理论和质化研究为主,将环境视为公共议题的建构及公共话语生产与再生产的“场域”[18]。刘景芳从西方环境话语中梳理出四大运动思潮,号召环境传播回到由伦理和价值驱动的学科[19]。

国内环境话语史研究较少,还未有系统的环境话语变迁研究。自1972年各国政府参加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第一次共同讨论环境问题开始,环境话语在外交场域就承载了一个国家的价值取向,不同的需求重点、发展理念和话语背景产生不同的认知和话语,需要构建带有自己立场、观点和态度的环境话语体系。[20]黄河研究2003—2012年《人民日报》,发现主流媒体环境议题报道框架以政策叙事为主,并未形成多元的利益表达机制,[21]这在强调平等、沟通、协商的新媒体语境下会面临话语权渐失的窘境。

环境话语理论研究较为薄弱,但从现象到机理的深入却是发展方向和重点。一部分研究环境传播修辞理论:“接合实践”是将环境议题与既定话语逻辑体系进行勾连,赋予事物合法性框架和意义思考路径,以达到话语深层劝服目的;[22]“意指概念”关注环境相关术语的生产再生产,每个意指概念都以特定社会、权力和文化等宏大话语的生产和运作为背景,正因为被建构成矛盾或争议,社会议题才被发现和关注,冲突或运动大多因为不同主体在意指概念上未对话语意义达成共识[23]。另一部分关注话语机制和运行逻辑:周裕琼分析了中国社会抗争的话语体系文化资源(见图1);[24]汪磊梳理了环境抗争事件的演化路径(见图2)[2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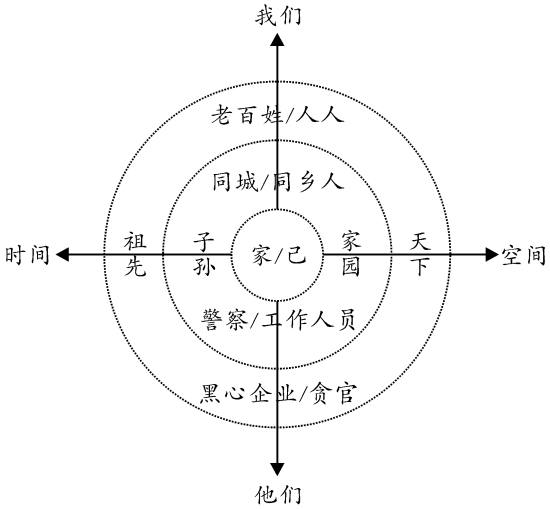

图1　中国社会抗争的话语体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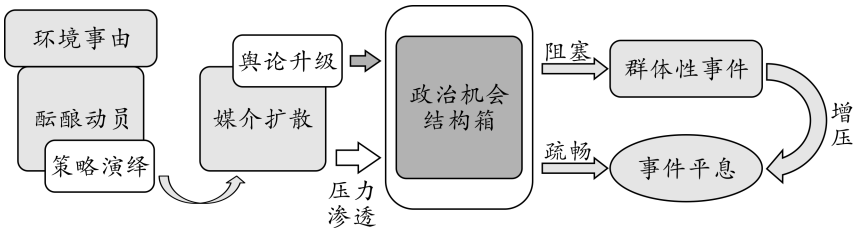

图 2　环境抗争事件演化路径

2. 实践视角：多元环境传播主体的媒介话语

考克斯的七种传播主体媒介话语实践研究是受关注最多的主题，各方利益主体的话语实践基于社会地位、媒介权力、身份关系和价值观念而不同。卓光俊实地调研双廊客栈排污事件，发现知识分子和媒体作为地域性意见领袖影响力最为突出，原住民反而作为话语弱者依靠他者表达意义和价值诉求，商户则基于公共危机管理的逻辑框架发声。[26]报纸报道土壤污染显示，政府拥有显著的媒体近用权而拥有议题的主要话语权，专家学者积极发声，企业则回避突发污染事件。[27]紫金矿业污染事件报道中，主流话语从企业的公共危机和经济损失角度解读污染事件，网络评论却在疾呼民众生存权和健康权。[28]针对地方环境事件，国家追求整体利益，强调经济、社会、环境的和谐发展，地方政府则采取工业主义价值取向，从生态行政理性主义出发必然出现话语不一致。[29]

官方、民间、媒体作为三方舆论场，其间和内部话语意义争夺与策略性操作明显。新浪微博作为新兴舆论场，成为夺取话语权的重要渠道，余杭中泰垃圾焚烧事件研究显示普通民众通过微博实现自我赋权并参与公共事务，政府通过政务微博矩阵一方面与公众互动和舆论引导，一方面通过管理内容、关键词、博文等方式争取话语权。[30]笔者发现类似隐性话语权争夺方式也出现在绿色公众号上。不同话语联盟之间从话语内容、话语政策和制度结构都存在互动和竞争，PM2.5 从专业术语到被纳入新的《环境空气质量标准》强制性检测项目进程表明，环境政策论争不单是技术性论争，而是不同主体针对同一现象赋予符合自身利益的话语意义，是传统实用主义话语联盟和生态现代化话语联盟经由话语的“结构化”和“制度化”争夺话语霸权的过程，是行动者观念信念交往互动的结果，并且主观性话语与制度性结构因素相互影响相互建构。[11]由此警醒，其他社会争议和公众事件是否也存在着话语霸权和话语遮蔽？

在不同国家媒体间，国家内部媒体之间，媒体平台内部，环境运动之间，各方话语竞争主体多元话语框架均存在着互动与扩散。曾繁旭研究《南方都市报》《科技日报》《人民日报》框架分析发现，即便他们在意识形态、商业利益、专业主义方面存在官方立场、公众立场、专家立场等不同站位，但针对 PM2.5 话语传播，《南方都市报》作为框架制定者后续被另两家沿用，框架扩散和共鸣最终导致媒体联动，党报也在适时接收其他报纸的框架扩散。[31]环境运动之间同样存在行动方式和话语的扩散，传统媒体介入传播运动模式、搭建互动平台和提供行动话语。[32]

大众传媒是利益主体争夺话语权力的主要场域，环境群体性事件实质上是环境利益主体间的话语博弈，在知识、话语与关系视角下环境话语运行逻辑是：建构知识—生成意义、符号、修辞和隐喻—知识和逻辑合法性—掌握建构环境意义的权力—获得社会认同—建构相适应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制度。[33]所以，媒介环境话语成为近年的研究热点。

3. 抗争视角：环境抗争性话语与反话语空间

考克斯的对抗性话语和约翰·道宁的反话语空间均指涉利用话语对现实主流价值的挑战，对抗工业主义话语。话语对抗的逻辑是“‘以修辞的方式’探寻环境与人类生存、环境与人类契约、环境与个体价值之间某种象征性联系，借此构建一种合法化的、集体性的生态想象图景或环境政治图景”[14]，也侧面揭示了环境话语核心关键词为表征、策略改造、意义生产、合法化、认同、想象共同体。

反话语空间在新媒体中表征较为突出,成为社会情绪的表达出口。“另类媒体 L”通过线上线下互动“零废弃”话语与官方垃圾治理话语“焚烧”形成对比,通过独特的修辞、叙述、话语初步建立了绿色公共领域,但尚未在权力-技术共同体-民主共同体之间形成稳固沟通渠道,显示出官方和民间的绿色话语体系尚未并轨。[34]笔者对近三年绿色公号 10 万+中 16%的反话语空间文章进行内容分析发现,社交媒体中绿色抗争性主体、议题和对象更为复杂:民生话语反抗环境污染、科技话语质疑治理可行性、环境责任反抗舆论话语;关注议题为雾霾治理的有效性、环保工程的科学性、治理路径的可行性、安全应急的实用性;抗争对象直指工业霸权技术理性和管理效度。

如果说刘涛所列两种反话语空间建构路径“环境消费话语”和“独立媒介环境话语生产”对抗性不够强烈或强调替代性声音的话,在新社会运动中的话语生产及实践则充满着利益冲突和权力争夺。周裕琼研究番禺垃圾事件中行动者如何借由媒介将前期运动的话语和脚本进行建构、选择、传承和复制,“我们不要被代表”就成为番禺事件的独特遗产被复制到重庆化工厂搬迁、平南高速环评等环境抗争事件中;通过“二噁英有毒”“保护绿色家园”“我们不要被代表”“垃圾分类”系列话语策略性框架转移,实现共识、动员、沟通和环保;媒体和抗争者同样在进行“互激模式”的“隐秘互动”,抗争者“给他们提供素材,让他们有所突破,不断的冲破禁令”,“不断有持续性的话题来报道”。[15]话语策略性改造可以有效实现社会动员和迂回抗争。

4. 语境视角:环境风险话语

德国社会学家贝克的风险社会理论将风险和作为知识构建重要场域的媒体高度关联,但其对传媒在风险议题建构中的角色研究颇为分散和割裂。李艳红发现大众媒体不仅能为社会的经验理性表达提供空间,而且策略性地使用制度理性,将环境由科学问题扭转成公共决策问题,以程序正义和公众参与等社会制度术语对抗充满不确定性和技术与资本结盟的技术理性术语,由此培育社会理性,成为风险决策机制民主化动力。[35]此研究丰富了贝克的社会经验内涵,对传媒在风险知识的认识、接受、合法化、生产、建构过程中的中心角色作了剖析。

即便风险话语传播能完成环保说服、风险告知、民主动力等功能,其掩盖性和复杂性也很明显。环境话语中的委婉语能够掩盖环境背后隐藏的权力关系,对受众发挥“规训”与“宰制”作用,显示风险政治学特征;话语通过议题置换、片段式报道、模糊言说等遮蔽环境风险的成因和后果,并以公关营销洗绿商业企图。[36]目的性选择、模糊性用语、符号化使用等通用性策略框架会掩盖环境与商业和权力的勾连,在环境运动中的动员逻辑和话语表征尤其复杂。底层群众为规避风险和矛盾冲突,在隐忍姿态中建立隐性防御体系;出于利益受损和风险预见,新媒体的技术便利造就了夹杂着理性诉求的反话语空间;恐惧话语蔓延易催生对抗式环境风险解读;动员逻辑起于底层话语的解放,以象征符为载体的情感表达容易获得认同,话语煽动和情绪感染常引起二次狂欢。[37]环境风险话语的生产和传播裹挟着大量的社会因子成为现代性社会建构不可绕开的主题。

5. 语用视角:环境话语语义修辞

修辞对于环境传播有两种作用:话语生成的实践方式和话语意义争夺的途径,分别对应考克斯的实用主义修辞和建构主义修辞,进行话语表征、传播事件和建构公共议题及社会现实。政府环境话语和主流媒体话语以“隐秘的互动”共同构建低碳神话,媒体通过生命、安全、战斗、财富等隐喻建构神话,通过环境框架和典型故事建构绿色意义,看似与自然相关,实质是人为建构和权力互动。[38]以兰州自来水污染事件为蓝本,可从符号再造和修辞实践角度解读环境公共事件中的话语运作过程:通过对自然符码体系进行符号的识别和选择完成符号化实践,激活和召唤符号意义;在伴随文本语境和场合语境下完成意义赋值和生产;利用话语“接合”的勾连和争夺,给意义生产和社会劝服招募或挪用“更大的意义”的话语框架,实现公共议题构建。[39]绿色广告的漂绿修辞及其意识形态剖析能够揭示环境与商业的联姻,漂绿广告是资本在保证政治正确前提下策略性应用话语修辞,在环保认同中寻求广告话语的合法性,在危机情境中设置竞争性话语框架,借助绿色隐喻塑造商品和自然

的勾连与想象,最终达到劝服消费的目的。[40]

视觉转向是当前环境传播的重要修辞逻辑。图像以其非理性刺激、多样化释义及政治安全特质,成为文本不可比拟的实践修辞,其以风景照片、政治漫画与新闻摄影为表征方式,构造人们认知世界的途径导向和符码体系,以此理解并参与绿色行动,实现生态中心主义环境伦理外化与传播。[41]一方面图像以多模态介入到环境话语,“借助图片、绘画、电视、电影、游戏、电脑媒体对空间、环境、生态和自然进行视觉表征”[42],另一方面,环境公共事件的媒体图像意义又受规制于文化、政策、事件、伴随性文本以及心理语境[43],显示图像话语编码解码的复杂性。

6. 功能性视角:环境外交话语、环境法制话语、环境伦理话语、生态批评话语

随着环境成为全球共享议题,环境话语在社会运行和国家制度管理中,对内伦理教化与对外交往互动的功能性作用凸显。1992 年《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以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作为国际环境合作原则,但当前面临西方环境话语的解构和挑战,我国必须建立起中国特色现代化环境话语体系,以期在国际环境议题上发声并彰显立场。薄燕建议继续强调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事实;提出公平、科学、可操作性的中国方案;挖掘理论基础和依据,从学术话语转变到外交话语,做好科学话语储备;涵盖所有国家的全球性责任体系;提高参与全球气候变化治理的合作能力。[44]蔺雪春考察表达主流价值和共识的全球环境话语体系与联合国系列制度化建制之间的关系,环境话语在风险确定、蓝图绘制、行为预期和构建身份方面促进治理机制;环境治理在提供讨论平台、促进环境思考范式转变、加强学习/沟通/理解方面促进环境话语;同时双方在关注点、现实境况、知识体系、讨论行为体、方式与程序等方面相互制约。[45]英汉环境保护公益广告进行生态批评分析显示,英文广告话语通过心理过程凸显生态意义,中文主要通过动作过程表达生态意义。[46]

(三)环境话语研究理论资源

环境话语作为意义承载物,以符号、修辞、语境进行意义生产和表征。德莱泽克研究发现环境话语通过基本实体、假定、动机、修辞四个要素构建自身。[29]宏观解读上,符号表意本身具有片面化与量化特征,“只要符号化,哪怕看来完全没有意义的,也可能被解释出意义”;作为表意底色的伴随文本和场合语境,隐含着难以觉察的劝服逻辑和意识形态,自动架设了受众的认知模式和解读框架。[47]由此揭示了环境话语作为意义符号的“被操作”和“非全面”。微观操作上,图像以罗兰·巴特符号学“刺点”寻找受众关注的“痛点”和“焦点”,往往依靠毫不起眼的小物引发强大的情感共鸣;[48]借助修辞为词语嫁接意义最终形成话语场,接合概念用于析出事物和意义之间的对应关系,将环境话语与一种更宏大更公认的意识框架相关联;[22]意指概念同样勾连词语与意识形态,为意义再生产奠定基础条件。

话语传播的过程就是意义争夺的策略实践和再生产过程,话语-认知-传播-社会相关理论凸显。福柯的话语权力理论将话语认定为斗争的实践,环境污染事件实质是“不同行动者针对某一环境污染想象所赋予的不同意义之间的话语竞争”。[49]后福柯话语分析框架在将话语、知识和权力相联系的基础上认为话语结构就是社会权势,不存在中立性。[26]为了获取受众认同,一方面话语借助劝服理论、态度系统、需求层次理论、社会动员理论迎合受众需求,另一方面,通过框架自设或借鉴他者媒介、运动和行动者的“意识形态框架、运动策略和组织形式”来实现扩散。对抗性话语和反话语空间是意义争夺的激烈方式,象征新生力量的他者声音挑战现存主流观念、社会秩序和意识形态,荷兰学者马汀·哈杰话语联盟框架能够梳理出立场各异的多方意义主体。

宏观社会和环境事件本身均成为环境话语的建构客体,并呈现三种特性。双向性:贝克风险社会理论显示现代性社会下环境话语修辞可以建构风险存在,也可以遮蔽风险的危害。相互性:法国学者布尔迪厄认为场域是各客观关系组成的网络或构型,[50]建构主义理论认为建构过程在于行为体和结构间持续进行型塑和互动,[45]所以环境话语对科学、心理、艺术、政治等多个场域的融合,以及技术和制度对话语权的制约都间接影响其对社会和事件的建构。独特性:媒体作为环境传播多元

主体话语交锋场域,是否成为哈贝马斯绿色公共领域,还得决定于社会场景的具体特征;为更有效解释环境传播中的种种现象,有学者对培养分析理论、议程设置理论、媒介依存理论、叙事架构理论和知识鸿沟理论等传播理论进行了替代性解读,[4]作为意义载体的环境话语有必要结合中国语境和时代特征进行独特理论摸索和体系构建。

表 1　环境话语研究理论资源分布

一级理论	二级理论	文章数	过程分属
修辞理论	隐喻、比喻、神话理论	7	表征生成
	委婉语理论	4	表征生成
	接合理论	3	表征生成
	意指理论	2	表征生成
符号学	罗兰·巴特符号理论	3	表征生成
	赵毅衡语境理论	1	表征生成
语言学	系统功能语法	2	表征生成
权力理论	福柯话语与权力理论	5	意义争夺
	后福柯话语分析框架	2	意义争夺
	皮埃尔·布尔迪厄场域理论	2	意义争夺
话语分析理论	批判话语分析理论	5	社会建构
	框架分析理论	6	意义争夺
社会心理学理论	认知理论	2	意义争夺
	运动扩散理论	1	表征生成
	动机理论/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	3	意义争夺
	劝服理论	3	意义争夺
	社会动员理论	1	意义争夺
	态度系统	1	意义争夺
国外环境理论	德莱泽克四大话语类型	2	社会建构
	考克斯实用、建构主义,对抗性话语	4	社会建构
	马汀·哈杰话语联盟	1	意义争夺
	深层生态学理论	1	社会建构
	生态女性主义	1	意义争夺
	环境正义	1	意义争夺
传播学理论	危机传播/贝克风险社会理论	4	意义争夺
	议程设置理论	1	意义争夺
	文化理论	2	社会建构
	霍尔对抗式解读	1	意义争夺
	建构主义理论	2	社会建构
政治经济学	政治机会结构理论	2	社会建构
	退出、呼吁、效忠理论	1	社会建构
	知识赋权	1	社会建构
	公共领域	2	社会建构
	马尔科姆·沃斯特三种权力力学	1	社会建构
	新社会运动	1	社会建构

(四)环境话语研究方法

环境话语研究以质化研究为主,具体方法集中于文本分析、内容分析、理论推演和个案研究。文本分析以框架、话语和批判话语分析为主,研究者都试图将社会纳入分析语境,挖掘文本遮蔽内容,但只有 14%承接了批评视角。内容分析多是分析某一环境事件(术语)在相关报纸、微博、公众号上的报道,但缺乏提问、抽样、编码、数据统计、讨论分析的严谨结构性研究,只有极个别使用了差异显著性等科学检测手段,方法操作欠缺规范性。个案研究成为最常用的切入点,话题涉及湖北仙桃垃圾焚烧、双廊客栈排污、雾霾 PM2.5、常州毒地事件、土壤污染、余杭中泰垃圾焚烧事件、哥本哈根气候大会、紫金矿业污染事件、三峡工程生态环境、兰州水污染事件、昆明 PX 事件、怒江事件等,个案深描有助于挖掘事件细节,通过对行为或语言阐释呈现背后的意义内涵,但同时会带来通用性规律的欠缺,难以提升到理论逻辑。理论研究呈现出作者集中和焦点集中的特点,如刘涛、郭小平、周裕琼、李艳红等,焦点集于抗争性话语和话语修辞研究。国外本领域研究方法有三种:生态文化多样性的方法,生态语言学和批评话语分析,其中批评话语分析方法主要有荷兰认知派樊迪克、英国系统功能语言学流派费尔克拉夫、话语历史分析流派 Wodakwe 以及德国流派,使用频率较高的理论是福柯话语理论和后福柯话语分析框架即辩论式话语分析,[13]相较在国内环境话语研究以批评话语分析见长,生态语言学稍逊之。

表 2　环境话语研究方法分布

量化研究		质化研究	
方法	数量	方法	数量
调查问卷	3	民族志	1
实验法	1	田野调查	2
内容分析法	11	访谈观察法	2
		符号学文本分析	1
		框架文本分析	8
		话语文本分析(樊迪克)	7
		批判话语分析(费尔克拉夫)	14
		文献资料研究	5
		历史比较研究	5
		理论研究/推理演绎	17
		个案研究	10

四、结论与展望

(一)环境话语研究版图:三区域二焦点

中国环境话语研究内容分属文本表征、意义争夺、社会建构三区域,完成话语意义的生产再生产,社会和事件的建构与被建构。统计表明,不管是谭爽从表征、互动、结构三个维度研究另类媒体的绿色话语生产和绿色公共领域建构,还是张海柱从内容、策略和制度结构三个维度研究不同话语联盟在 PM2.5 政策论争中的互动和竞争,环境话语研究都能被分列到文本表征、意义争夺、社会建构三大区域中。作为基准逻辑的费尔克拉夫批判话语分析方法,从文本、话语和社会三个维度统合着话语对身份、知识、关系的建构,[51]统领和调配着话语研究的内容、理论和方法。以福柯为代表的后结构主义者将话语分析用于揭示话语背后隐藏的权力和意识的斗争,[52]“话语——权力”无缝链接了各研究取向。

表 3　环境话语研究区域分布

	文本表征	意义争夺	社会建构
批判话语分析	文本	话语	社会
研究内容	多元环境传播主体话语 生态语用话语	环境抗争性话语 环境风险话语 环境行动者话语 环境伦理话语	环境史论话语 环境外交话语 环境法制话语 生态批评话语
研究理论	修辞学 符号学 语言学	权力理论 社会心理学 传播学	传播学 政治经济学 话语分析理论
	环境传播理论		
研究方法	调查问卷 内容分析 文本分析	民族志 田野调查 访谈观察 话语分析	理论推演法 历史比较法 文献资料法
传播话语分析	修辞话语分析(RDA)	言语行为理论与会话分析(CA) 福柯话语与权力理论	批判的话语分析(CDA)

从“个体与社会”“话语结构与意识形态”的二元分析理路出发,本文界定环境话语是以多模态环境符号进行意义生产再生产,对社会和环境事件建构被建构的循环实践,研究焦点集中于策略改造和隐性规训。策略性框架指达成共识的框架整合需要提前谋划布局,并非自然性行为,[53]修辞、符号、框架、互动、对抗、扩散都可纳入策略性范畴,既包括对话语本体嵌入意识和目的的微观操作,又包括实践过程中对权力合法性和正当性的争夺。将福柯的空间规训思想进行引申,社会是话语实践和权力争夺的拟化空间,对公民认知和通行价值的培植都可通过话语规训实现,“话语是一套陈述体系,旨在建立一种‘排除的规则’”,可以决定真理性、合法性、可知权等。[54]环境话语“不是凭借权力、法律和惩罚,而是根据技术、规范化和控制来实施”[55],是对话语受者和社会法则的隐性规训。

有学者将生态话语批评分为两个向度:一是从符号学延伸出来的生态话语批评,通过分析隐喻、明喻、暗喻和委婉语路径,揭示媒介环境话语同资本、权力和政治的复杂勾连及背后的意识形态和伦理;二是政治经济学视角关注生态话语与霸权、权力和政治经济的勾连,揭示环境问题是技术、社会、经济、文化甚至政治的融合体。[36]笔者认为还应加入传播实践中的意义争夺与互动向度:谁掌控话语权?怎样解读话语?意义如何流转?何为话语媒介?语言学视角下的环境话语强调自然主义生态语言学意义,是对环境的感知和观念的集合,[56]起于环境,定于语言,而传播学视域下的环境话语更关注语言表态下的话语动态实践,主体交往互动、意义互构互训。

(二)存在的问题与争议

环境话语理论引进和自产都比较薄弱。国外生态社会学理论、议题关注周期理论、环境行动与认知理论、话语包理论、图像政治理论等具体环境理论还停留在描述引介阶段,缺乏系统性深入解读。参考专著集中于考克斯的《环境传播与公共领域》、德莱泽克的《地球政治学:环境话语》、费尔克拉夫的《话语与社会变迁》和樊迪克的《作为话语的新闻》,国内经典著作较少。研究样本以媒介文本为主,图像政治、环境纪实摄影、漂绿广告等陆续进入研究视野,但短视频、纪录片、口号、政策、公益广告等还没有或极少被关注过,多模态环境文本还有待于被挖掘拓展。研究以个案研究和描述分析为主,缺乏通用性规律研究,理论应用浅尝辄止,研究思路集中在批判话语分析,但挖掘深度非常有限,虽形成了抗争性话语形式库、环境话语接合修辞、抗争性标语文化逻辑、漂绿修辞及其意识

形态批评、社会理性消解科技理性等优秀成果,但学理性较强的论文只占 17%,且研究深度和作者群体存在两极分化,本研究领域还未形成蔚为大观的景象。

研究偏重“炒现饭”,环境话语实践策略寡淡。“批判”二字不仅意味着解蔽和澄清还强调调停和解决。[57]郇庆治提出环境话语研究应体现三方面职能:构建理论话语、学术批评、倡导和推动话语走向实践。[58]既有文献多基于揭示暗含的被遮蔽的意识形态、霸权利益、权力争夺和利益冲突等,但鲜从建设性角度解放被遮蔽的客体并提供可操作性的技术或办法,陷入只说不论,只论不解,只解不执的泥沼。

中国绿色公共领域的生成与否观点不一。媒体作为环境传播多元主体的主要话语场域和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相勾连,对此研究者们有不同解读。社交媒体中抗争性环境话语彰显公共领域特征,谭爽通过研究另类媒体 L 发现线上官方与民间的绿色话语体系尚未并轨。[34]徐迎春等建议中国不必刻意追求批判性公共领域,提供多方话语对话、协调、论争平台的绿色公共话语空间更有实际价值。即便个案媒体初步具备公共领域的特征,尤其另类媒体能够形成与官方话语体系的对峙,但不能就此评判中国是否形成公共领域,尤其公共领域中其他重要利益相关者失语的情况下更待考证。

现实环境治理涌显出多路解决方案,涉及环境科学、环境哲学、环境社会学、环境法学、生态语言学等多学科,但以传播视角建构社会绿色价值观的研究相对缺乏。一是科技说:政府通常采用专家的技术知识即“科学话语”来应对各种环境事件,但是,科学话语是否就是无懈可击?二是伦理说:刘华杰作为科学传播研究学者,从辩证角度看待科学话语权与环境问题,避免让科学担任环境保护政策制定的唯一或主要根据,因为环境政策平衡利益与科学因素不能体现真实关系,要提倡环境伦理学,纳入人文因素,将科技的客观性与话语的协调性相结合[59];唐代兴认为环境问题涉及环境本体、环境认知和社会结构,要思考在律法、道德、理想生存面前,人性和人欲如何造就人与环境的根本对立,国家环境治理学的理论基础应该跨越环境自然学、环境社会科学、环境哲学[60]。三是实用说:姬志闯从哲学角度批判了理性主义伦理和现代生态学话语,认为应该放弃纯粹的理想理论建构,而是“把理论言说切实的置入生活事实”,“现实问题的实践性解决既是环境伦理的发生由启也必然是其最终目的”[61];李亮提出用民主实用主义话语,倡导通过参与、讨论、咨询、交流、审议、立法等方式,实现交互影响式表达推动集体性认同和价值共识[29]。

(三)研究共识与发展路径

当前环境话语研究路径分为两支。表-里-境研究路径:以“符号化-语境生产-话语接合”的符号学路径研究环境公共事件[39],以“修辞资源、框架形态、话语形式、修辞实践、接合机制、阶层批判”的修辞学路径研究环境文本[62]。多数话语研究基于此研究思路,区别在于对意义解读和语境建构的深广度和贴合度,不止于表面的语言结构解析,能从历时性和共时性角度深度挖掘社会因子才是发展之道。点-面-理研究路径:比如周裕琼把 22 起环保事件与征地事件中的 143 条标语综合分析,寻找中国抗争话语体系的文化资源和话语逻辑;刘景芳对六家 NGO 网络话语进行历时性对比,挖掘中国语境下 NGO 话语区别于西方绿色公共领域的独特之处;汪磊梳理近 8 年 20 个重大环境事件,提取出环境抗争事件演化路径。这种思路试图挣脱传统个案深描研究,横向寻找多案例中带有普遍性和规律性的机制与特点,也许更能支持一个学科从现象学走向术理学。

经由话语权力理论、符号理论、框架理论、建构理论等在环境话语研究中的普遍应用,研究者形成部分共识:话语超越信息本质成为一种社会实践,即便位于基础层级的生态语言学也认为其是对环境问题的感知和观念的集合,是“主观诠释”和“意义宣称”,与传播学的“精神交往”不谋而合,话语实践的过程,便是意义生产和再生产的过程;话语作为意义生成物成为象征性权力,现代社会规训从法制、武装、经济、地位等硬性指标拓展到文化、舆论、网络、价值等象征性主体,且来势汹汹裹挟整个社会;秉持环境话语的语言-社会研究进路,话语生成、实践和作用的场所是社会空间,只有根植于当前社会语境下才能把握其命脉内涵,保障研究成果的可信度和可用性。

环境话语作为环境传播学核心研究区域,应明晰自身专属概念、研究边界、学术语言、学科特色和价值所在,提出学科域内研究问题。表征方面:网络社会下话语权力的实践载体和形式是什么?掌握何种社会资料后能拥有话语权力?运用的策略化手段是什么?中国环境话语的历时性价值排序是什么?意义方面:话语正当性获得一靠自身逻辑,二靠传播建构?公众对何种环境话语接受度高或易产生对抗性解读?多元环境传播主体的各自话语逻辑和文化资源是什么?商业领域生态话语如何形成话语霸权?如何融合主流环境公共议题和新环境运动的"反话语"空间?建构方面:环境话语对城市生态建设和市民认知的实际作用如何?环境伦理话语如何通过传播交往形成社会共识?探讨官方话语如何从环境信息到价值意义的符号化表征与象征性建构融合到另两个舆论场?如何在风险社会建构生态文明价值导向?实践方面:新时代五位一体语境下,"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如何深化为符合逻辑和中国立场的对外话语体系?环境话语如何融合自然科学进行环境治理?媒介话语如何推进中国生态文明建设?如何构建中国生态文明的系统媒介"话语场"?笔者试图从环境话语实施本体、时空场域、实践进程三个层次展望环境话语研究。

表 4　环境话语研究格局展望

实施本体	文本(媒介)	行动者(七方)	运动(群体)
时空场域	历史(变迁)	传播(交往)	语境(风险)
发展进程	生产(符号)	意义(权力)	建构(文化)

建构主义视角下传播目的"公众认知"和"社会结构"与批评话语视角下环境话语"意义争夺"和"社会建构"功能相匹配,环境话语的性质定位和研究取向基本已经明确,研究范式应从描述性分析和个案研究深入到通用性规律揭示和话语技术性应用,着力回答怎么样,为什么,怎么办。尤其在当前推进生态文明、绿水青山、美丽中国等现代环境话语传播效用时期,对标国家"加快建立健全以生态价值观念为准则的生态文化体系"要求,突破单纯靠自然科学解决环境问题的狭窄路径,环境传播应作为环境治理、环境伦理、环境认知、风险社会等环境科学的"引力"和"牵线"发挥作用,环境话语则是那根"针"。

参考文献:

[1] 刘涛. 环境传播:话语、修辞与政治.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1:2.
[2] 胡春阳. 传播的话语分析理论. 上海:复旦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5. [2018-11-17] http://kns. cnki. net/kns/brief/default_result. aspx.
[3] 罗伯特·考克斯. 假如自然不沉默——环境传播与公共领域. 纪莉译.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17-20;20.
[4] 刘涛. 环境传播的九大领域(1938—2007):话语、权利与政治的解读视角. 新闻大学,2009,4:97-104.
[5] 潘涌. 中国特色新话语:语用结构、表达品质和价值特征——纪念改革开放 40 周年. 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6:1-12.
[6] 闻杰. 贫困的守护——有关资源环境保护的话语. 创造,2004,1:36-37.
[7] 马丽. 伦理话语转换和生态环境伦理中的资源概念. 哲学研究,2004,1:78-82.
[8] 乌尔里希·贝克. 风险社会. 张文杰,何博闻译. 南京:译林出版社,2018:1-410.
[9] R. Guillierie, A. C. Schoenfeld. An Annotated Bibliography of Environmental Communication Research and Commentary: 1969-1979, Cautbus: ERIC, 1979: 5.
[10] N. Luhmann. Ecological Communication,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9: 28.
[11] 张海柱. 环境政策论争的话语分析——以 pm2. 5 争议与环境空气质量标准修订为例. 太平洋学报,2012,6:62-70.
[12] J. S. Dryzek. The Politics of The Earth: Environmental Discourse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5: 13-16.
[13] 王晋军. 国外环境话语研究回顾. 北京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5:29-34.
[14] 刘涛. 环境传播与"反话语空间"的媒介化建构. 中国社会科学报,2012-09-19(A08 版).

[15] 周裕琼,蒋小艳. 环境抗争的话语建构、选择与传承. 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4,5:131-140.
[16] 刘景芳. 中国绿色话语特色探究——以环境 NGO 为例. 新闻大学,2016,5:8-16.
[17] 沈承诚. 西方环境话语的类型学分析. 国外社会科学,2014,5:58-67.
[18] 岳丽媛,张增一. 国际环境传播研究的现状与趋势——基于《环境传播》的分析. 自然辩证法研究,2016,1:61-65.
[19] 刘景芳. 从荒野保护到全球绿色文化:环境传播的四大运动思潮. 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3:102-109.
[20] 杨凡. 基于中国环境话语构建下的环境史学解读. 绿叶,2018,9:43-51.
[21] 黄河,刘琳琳. 论传统主流媒体对环境议题的建构——以《人民日报》2003 年至 2012 年的环境报道为例. 新闻与传播研究,2014,10:53-65.
[22] 刘涛. 接合实践:环境传播的修辞理论探析. 中国地质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1:62.
[23] 刘涛. 意指概念:环境传播的修辞理论分析. 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2015,2:54-58.
[24] 周裕琼. 从标语管窥中国社会抗争的话语体系与话语逻辑:基于环保和征地事件的综合分析. 国际新闻界,2016,5:52-88.
[25] 汪磊. 环境公责及其抗争话语的图谱. 理论学刊,2013,6:11-14.
[26] 卓光俊,薛葵. 环境事件中多元利益主体的话语实践分析——基于云南民族生态地区的实地调研. 国际新闻界,2017,7:107-118.
[27] 陶贤都,李艳林. 环境传播中的话语表征:基于报纸对土壤污染报道的分析. 吉首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5:108-114.
[28] 蒋小艳,周裕琼. 论我国环境公共事件中的双重话语——以紫金矿业污染事件为例. 湖州师范学院学报,2012,5:109-114.
[29] 李亮,郭辉. 常州毒地事件中政府环境话语分析. 南京林业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6,2:58-63.
[30] 方爱华,张解放. 环境群体性事件中政府、媒体、民众在微博场域的话语表达——以“余杭中泰垃圾焚烧事件”为例. 科普研究,2015,3:19-28.
[31] 曾繁旭,戴佳,郑捷. 框架争夺、共鸣与扩散:pm2.5 议题的媒介报道分析. 国际新闻界,2013,8:96-108.
[32] 曾繁旭. 环境抗争的扩散效应:以邻避运动为例. 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3:110-114.
[33] 沈承诚. 论环境话语权力的运行机理及场域. 学术界,2014,8:85-94.
[34] 谭爽,任彤. “绿色话语”生产与“绿色公共领域”建构:另类媒体的环境传播实践——基于“垃圾议题”微信公众号 L 的个案研究. 中国地质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4:78-91.
[35] 李艳红. 以社会理性消解科技理性:大众传媒如何建构环境风险话语. 新闻与传播研究,2012,3:22-33.
[36] 郭小平. 环境传播中的风险修辞:“委婉语”的批判性解读. 新闻与传播研究,2012,5:25-33.
[37] 李春雷,舒瑾涵. 环境传播下群体性事件中新媒体动员机制研究——基于昆明 PX 事件的实地调研. 当代传播,2015,1:50-54.
[38] 徐迎春. 隐秘的互动:政府环境话语和主流媒体的“低碳”神话建构. 浙江传媒学院学报,2015,6:34-42.
[39] 刘涛. 环境公共事件的符号再造与修辞实践——基于兰州自来水污染事件的符号学分析. 新闻大学,2014,6:24-31.
[40] 郭小平,李晓. 环境传播视域下绿色广告与“漂绿”修辞及其意识形态批评. 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8,1:149-156.
[41] 刘涛. 图像政治:环境议题再现的公共修辞视角. 当代传播,2012,2:23-26.
[42] S. I. Dobrin, S. Morey. Ecosee: Image, Rhetoric, Nature. New York: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2009: 21.
[43] 郑广嘉. 新媒体时代环境运动的媒体图像传播与意义建构.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博士论文,2017. [2018-11-17] http://kns.cnki.net/kns/brief/default_result.aspx.
[44] 薄燕. “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与中国环境外交话语. 复旦国际关系评论,2013,11:192-217.
[45] 蔺雪春. 相互建构的全球话语与联合国全球环境治理机制. 南京林业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8,2:63-69.
[46] 何伟,耿芳. 英汉环境保护公益广告话语之生态性对比分析. 外语电化教学,2018,4:57-63.
[47] 刘涛. 新社会运动与气候传播的修辞学理论探究. 国际新闻界,2013,8:88.
[48] 罗兰·巴特. 明室. 赵克非译. 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03:96.

[49] K. M. Deluca. Image Politics:The New Rhetoric of Environmental Activism. Mahwah:The Guilford Press,1999:38.
[50] 皮埃尔·布尔迪厄,华康德. 实践与反思——反思社会学导引. 李猛,李康译. 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4:133-134.
[51] 诺曼·费尔克拉夫. 话语与社会变迁. 殷晓蓉译. 北京:华夏出版社,2003:12.
[52] 胡春阳. 话语分析:传播研究的新路径. 上海:上海世纪出版社,2007:3.
[53] D. A. Snow,E. B. Jr. Rochford,S. K. Worden,et al. Frame Alignment Processes,Micromobilization,and Movement Participation.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1986,51(4):464-481.
[54] 廖炳惠. 关键词 200——文学与批评研究的通用词汇编. 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6:8.
[55] 米歇尔·福柯. 性经验史:认知的意志. 余碧平译.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10:67.
[56] 郑红莲,王馥芳. 环境话语研究进展与成果综述. 北京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4:9-16.
[57] 殷晓蓉. 话语分析:如何为媒介社会语言实践提供说明? ——兼评《话语与社会变迁》的传播学意义. 广播电视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2:22-24.
[58] 郇庆治. 环境政治学视野下的绿色话语研究. 江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4:3-5.
[59] 刘华杰. 科学话语权与环境问题. 绿叶,2009,5:89-94.
[60] 唐代兴. 国家环境治理学的中国话语构建. 河北学刊,2018,5:10-16.
[61] 姬志闯. 语境的逃离与重建——从实用主义观点看环境伦理的话语建构. 科学技术辩证法,2007,1:23-26.
[62] 刘涛. PM2.5、知识生产与意指概念的阶层性批判:通往观念史研究的一种修辞学方法路径. 国际新闻界,2017,6:63-86.

Strategic Transformation and Implicit Discipline: The Academic Map of Environmental Discourse Research

Li Na, *Wang Meng* (Hebei University)

Abstract: Environmental discourse is the recycling practice of meaning production and reproduction with multimodal environmental symbols, which constructs and is constructed by social and environmental events. As the core research topic of environmental communication, it has important practical value for public risk awareness and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construction in the context of risky society. Through literature meta-analysis, the academic map of environmental discourse research in China can be described: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historical theory, practice, resistance, context, pragmatics and function, this paper deals with the text representation, meaning competition and social construction of environmental discourse, with the focus on strategic transformation and implicit discipline.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is the basic idea of environmental discourse research. It aims to break the shackles of individuals and texts, and bring society and ideology into analysis. It focuses on revealing the implied politics, hegemony and business of environmental discourse, but fails to mediate social risks and solve environmental problems. It is suggested the study of environmental discourse be developed from three levels: the noumenon of the implementation of environmental discourse, the space-time field and the development process, through four stages: representation, meaning, construction, and practice.

Key Words: environmental discourse; discourse analysis; environmental communication

■**收稿日期**:2018-12-18
■**作者单位**:李　娜,河北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河北保定　071002
王　梦,河北大学国际交流与教育学院
■**责任编辑**:汪晓清